

評介李宗黃先生回憶錄

申慶璧

愛默生說：「歷史是偉大的傳記。」讀了「李宗黃回憶錄」這本書後，我要為愛默生的話，下一轉語：「偉大的傳記是歷史」。

最近一百年，應是世界變化最大的世紀，也是中國變化最大的世紀。這一世紀中，我國變化的主導力量，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何謂國民革命？依照國父的解釋：「國民革命，乃為國民多數造幸福。凡事以人民為重，軍人與官吏，不過為國家一種機關，為全國人民辦事。」（共和與自由之真諦）再根據有關文獻分析：國民革命是以國民為主角的革命——「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負革命之責任。」（同盟會宣言）國民革命是以國民掌握武力的革命——「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迹於國內。其代之而新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北上宣言）國民革命是以國民掌握政權的革命——「我們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政治的民國。」（民權主義第四講）

李先生參加國民革命並把他所經、所歷、所見、所聞與所感，忠實的紀錄在這一本回憶錄中。他所寫的，雖是以他自己為中心，却不是單寫自己，而是寫所遇的人、事，所經的時、地。所寫的人，有了不起的人，也有極平凡的人。所寫的事，有驚天動地的大事，有常遇常見的小事。所寫的時，有千鈞一髮之時，也有悠遊自在之時，所寫的地，有通都大邑，也有窮鄉僻壤。與一些英雄式的傳記，要人的回憶錄，只紀大體的都不同。是八十三年來國民革命的縮影，也可以說是從事國民革命人物的抽樣調查。

國民革命的肇端，依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以後，盛於庚子，而成於辛亥。」國父所撰的中國革命史，則謂：「余自乙酉中法戰後，始有志於革命，乙未舉事於廣州，辛亥而民國告成。」李宗黃先生，降生時是民國前二十五年，溥清光緒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歲在丁亥，十二月二十一日；降生地是瀕臨安南、緬甸的雲南省鶴慶縣，逢密村，北坡頭地方。所生的時期，是一個外患頻仍的時期；所生的地方是一個商旅衆多的地方。

李先生自述他生的時代說：「當我來臨人世前兩年，中法戰爭閉幕，安南歸於法國，同一年裡，緬甸又被英國侵吞，我國西南屏藩盡撤，雲南門戶洞開，而外人侵略日亟，亞洲風雲瞬息萬變。國父孫中山先生便在我誕生那一年中，由檳香山回國，轉學西醫書院，鼓吹革命。另一方面，則慈禧太后歸政。致力海防，建築吳淞和江陰的砲台，也在為滿清一族統治的家天下，作最後的掙扎。盱衡全局，那正是大風暴來臨的前夕。」（卷一第二五頁）李先生是生在一个極不平凡的時代。

李先生自述他生的地方是「人間樂土，魚米之鄉，而且她的風景也是清幽兼美麗，明朝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就曾不辭千山萬水，長程跋涉，到過我們的村子。」（卷一第二七頁）但是這一個地方，也是古來征戰之地。李先生曾上溯至楚頃襄王使莊躡將兵至滇，歷叙唐、宋、元、明、清的開拓。李家的先世，係從明沐英征滇，可說是軍人世家。同時鶴慶也代有名將。在劉永福的軍中，蔣炳堂也是名將，他就是鶴慶人，記得民國二十三年，我由昆明至南京，曾與蔣氏的五女同

車，時這一位女士已五十餘歲，見我僕訥，認為姪輩，道經越南時，曾備述其先人在越作戰的軼聞。蔣家的福春恆號，國內重要商埠，都有分號，加以鶴慶幫，也是雲南境內商幫中的翹楚，據說慈禧太后的父親，作鎮統時，曾駐防鶴慶，慈禧亦隨在任上，李氏所生的地方也是一個不平凡的地方。

李先生係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啓程至昆明考陸軍小學的，在此以前都生活在鶴慶。他曾用五萬餘字來描述他鄉居的生活，對家庭溫馨，私塾生活，社會習俗，歷史文物，甚至鄉村山歌，都曾提及，可說是研究清季社會制度的翔實資料。也可以說是分析國民革命背景的史料。

自效而後，由雲南的陸軍小學，至武昌的陸軍第三中學，至保定軍官學校，這一階段由西南，而華中，而華北，李先生用九萬字來紀述，對陸軍中小學校學生生活，南北社會狀況，國家重要措施，均有扼要的記載。

武昌起義的槍聲一響，先生與向忠等同學，匆匆離開保定，直奔天津，加入同盟會，輾轉至武漢投效。參加戰爭受任為督戰參謀，參加了黃總司令發動的反攻漢陽之役，漢陽失守後，又起至鎮江，投效林都督述慶，派第三標，擔任督戰參謀，在攻南京天保城和太平門兩役中，有優異的表現，林督新成立鎮軍第六標時，被派任第一營管帶，兼第一隊隊官，李先生自己說：「我的軍事履歷相當特殊，不曾當過排連附長，一步就躋登營長的地位……若論一個人的經歷，還是很吃虧的。」（卷一第二二五頁）在這短短的時期

中，他曾獲清江浦一帶，智識青年的擁戴，驅散十三協的變兵，當時他的貢獻，誠如林督被黜後，在揚州平山堂，楊旅長瑞文，對他稱讚說：「嗨！你到過武漢，還攻過南京，又打清江浦而來？乖乖隆的冬。」轉頭去向他的衛兵說：「走的地方真不少哇，幾個大場面，全給他經過了。」（卷一第二四五頁）

李先生雖然不愉快的離開鎮軍第六標第一營管帶的職務，却愉快的踏上第十二師二十三旅第四十五團中校團附，兼旅部參謀。到民國元年九月代理團長。十月帶職至保定軍校復學。民國三年十月，保定軍校畢業。在這一年，還奉大總統授陸軍步兵上校實官，派為「南京宣威上將軍署一等參謀」。是年的七月間，李先生在南京結婚，結束了他的青年時期。回憶錄將他的私人生活，與國家大事，串成一片，讀起來親切有味。變革時期的政治社會和保定軍校的各樣各態，歷歷如繪。

在宣威上將軍公署內，李先生一無作為，於是向唐繼堯先生自薦，得於民國四年十月十九日，返回昆明，參加了雲南起義工作，進入了壯年時代。奉派為駐滬代表，經李先生的冒險犯難，使各省的反袁力量，與雲南起義的義師，深相結合。最重要的是使護國的戰爭，與國父領導的國民革命連為一氣，和說動馮國璋，按兵不動。因是當護國戰役結束，唐氏保薦實授陸軍少將，頒給三等文虎勳章。當面謁唐將軍謙辭時，唐氏勗勉說：「這是你自己出生入死，得來的汗馬功只勞，能說是實至名歸而已。我早已說過你這一

趙京滬行，勝於為我搬來十萬雄兵。」（卷二第二二二頁）並發表先生任都督府少將參謀處長，由此得到敬恭桑梓的機會。

服務雲南的期間，李先生不但經管都督府的軍務，而且也管外務，像章太炎等重要人員的赴滇，都是李先生負重責任，聞當時昆明曾流行一句話「唐繼堯的內務問膠嘉壽，外事問李宗黃」。民國七年雲南參加護法戰爭。李先生又奉派代表唐督，訪問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江蘇督軍李純。時唐督為了指揮方便，進駐畢節，對李先生的任務期望甚殷，因對李先生說：「我此次進駐畢節，和你的長江中、下游之行，可以說是同休戚、共生死的。成功，固可互相獎掖，失敗，那就祇有同歸於盡。」（卷二第二二九頁）這一階段，每歷一地，每經一事，都有報告。民國三十四年十月雲南省政府改組，筆者忝任雲南省政府主任秘書，曾調閱全卷，均係宣紙信箋楷書，每一報告，不僅陳述當時的態勢，而且為唐繼堯，借箸代籌，指出因應之計。

民國七年的七月間，李先生奉唐督的命，至日本採購兵工廠的機器至上海，晉謁國父，囑李先生順便考察地方自治，自此李先生在報國的工作上，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畢生從事的地方自治運動，自效生根。

李先生考察日本後，即行回滇。促成了唐繼堯氏與國父的合作，唐氏採行了他獻的策是「聯孫，保境安民，埋首建設，退出廣東、四川兩處羣雄角逐的場所。」（卷二第二五七頁）「對於岑春煊、陸榮廷、李根源等所把持的廣州軍

政府，先冷淡而漸行杯葛。終至猛扯他們的後腿，使其土崩瓦解，至於壽終正寢。」（卷二第二七七頁）

在此期間，唐氏派李先生籌辦昆明市政，先任市政公所籌備主任。民國八年五月十五日雲南市政公所成立，李先生任雲南市政督辦，仍任督署的參謀處長。至民國十年二月七日雲南發生政變，顧品珍接收了雲南政權，才離開昆明。雲南市政公所的轄境，實際只是昆明。昆明設市，是繼北京、廣州二市後的一個新興市，有小北京之名，是由李先生奠基的。

在民國九年十二月，國父回廣州復開軍政府政務會議，選舉唐氏為總裁兼軍政府交通部長，李先生任次長，他們都未到職，祇是遙領。雲南政變，唐氏想以此為退步，一人先行，囑李氏留守移交。惟唐氏路過海防時曾見國父指為新軍閥的談話，留在香港。李氏離滇後，趕至香港與唐氏會晤，唐氏已決定「漫遊歐美，以待將來。」（卷二第三〇二頁），嗣經李先生的勸說，並在國父與唐氏之間，幾經折衷，軍政府政務會議，順利通過歡迎唐繼堯案，並派馬君武、居正與李先生三人為特使，至港迎接。國父也躬親迎於江干。國父在歡宴唐氏的席間寄與莫大的希望說：「……以我們的三民主義，以我們的國民黨，再加上你們雲南勇敢善戰的十萬官兵，在一兩年之內，就可以犁庭掃穴，直搗幽燕，把北洋軍閥摧陷廓清，一舉救平。……」（卷二第三一二頁）

可惜國父與唐氏「交歡甫及十日，便告分

道揚鑣」（卷二第三一七頁）。推其原因係由於唐紹儀和陳炯明的離間，加上唐氏的地盤觀念和急於回滇報仇的心理作祟。唐氏悍然回滇，對國民革命的影響很大，據李氏說：「把原本可以作為北伐之力的滇軍四個軍拉了回去打內戰、爭地盤，使北伐軍的實力大打折扣，影響所及，包藏禍心的陳炯明發動叛變，使孫先生策劃多時的北伐大業，功虧一簣，為之瓦解。而且，更由於顧品珍業已準備出師參加北伐，唐公揮軍入滇，顧品珍的部隊無法出來，甚至不久幾乎全軍覆沒。」（卷二第三二三頁）

李先生把國父與唐氏合作，成為泡影引為憾事，但國父並不責備，反而寬慰他說：「歡迎唐某，本來是你一力促成。你用心良苦，無非為革命前途，當前大局着想……」，並且責成他「策劃打倒唐繼堯。」（卷二第三二二頁）在署理交通部長期間，並曾表現了行政管理的長才。民國十年五月五日，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後，派李先生為參議，總參議是胡漢民先生。國父為了整頓滇軍，曾派李先生任第二軍的參謀長，在短期內就做到士飽馬騰。這一支部隊，在「討伐沈鴻英各戰役，無役不與。就是討伐陳炯明也是主力之一。」（卷三第六一頁）在討陳之役，「石龍為廣州之咽喉，國父抱必守之心，示身殉之志。」第二軍以奇襲戰術，第二次克復。

「國父得知，遂與夫人親臨大沙頭。並向全體官兵訓話：『……我和你們同休戚共患難甚久，深知你們勇敢善戰，此次以一當十擊敗敵軍主力，使廣州轉危為安，我非常高興……』（卷三

第六一——六三頁）這些都可作為國史的材料。

民國十三年以後，李先生仍以全心全力投身在國民革命的大事業中。在黨務方面，出任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一直並連選連任，第六屆時復當選為常務委員，其間曾迭兼中央直屬江寧縣黨部委員，河南、雲南兩省黨部主任委員，及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翼贊中樞，出任疆寄，先後三十年。在政治方面，曾於抗戰期間，完成縣政計劃，達成蔣總統抗戰與建國並重的政策，於抗戰結束後，執行中央改組雲南省政府的命令，促進全國的統一。在軍事方面這一段期間李先生雖僅擔任過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參事，但曾奉國父命令組織陸軍四校同學會，延攬北伐抗戰時期的高級將領，仍以保定軍校畢業者為多，受他間接影響者不少。在實施憲政方面，自參加制憲國民大會，以至於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在二十餘年期間三度當選主席團主席，對維護憲政的工作，厥功甚偉。在促進地方自治方面，自民國七年以後，即念茲在茲，劍及履及，復於三十四年組織中國地方自治學會，團結全國精英，共同努力，並出席在美泰兩國舉行的國際地方政府聯合會，盡到與世界各國文化交流，與國民外交的責任，因接觸廣，而眼界自寬，經歷多，而色彩亦多。這些都是不平凡，而多有開闢建國的工作，雖文字不過一百廿七萬，珍圖不過一百一十六幅，但所有描述提供了不少黨史國史所無的珍貴史料。

古人論治史者必具的條件，劉知幾認為：「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

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杵斧斤，弗能成室。」（新唐書劉知幾本傳）而章學誠益之以「史德」說：「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文史通義內篇史德）何以故？「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賈操金，不解買貨，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抉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同前）章氏（學誠）所說的「史德」，即孔子論春秋時所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的「義」。用現代通行的話來說，應為「史觀」。李先生不是治史的人，我們雖不能以史才、史學、史識來衡量他的這本回憶錄。但他的才、學、識，却可以在這本書中見到。他寫作這本書，表面上雖是以個人的活動為中心，但揆之實際，却是以國民革命的發展為線索，而重心則置於三民主義實施的過程，這是可以斷言的，也就是說他有一個正確的三民主義史觀為骨幹。實為治近代史者，一本應讀的書。

我國史書，以年為主者曰編年，以事為主者曰記事，以人為主者曰傳記。李先生這本書，合三者而用之，並注重趣味，兼有稗官野史的可讀性，這些都是值得稱道的。這一本書由於分量重，李先生經歷的事過於多，要是加以吹求，小瑕小疵，不是沒有，但瑕絕不能掩瑜。因而我要以「偉大的傳記是歷史」，作為愛默生「歷史是偉大傳記」的轉語。

王雲五博士 主持

景印四部善本叢刊第一輯

十六種共七十冊布函彙裝十六套

售價九千元整。

宋元明佳槧盡現眼前

照原式十六開本景印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政劃撥帳號第一六五號